



当代哲学丛书

中国文化新体系

闵清 涂可国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新体系

闵 清 涂可国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永翔

(桂)新登字01号

中国文化新体系

闵清 涂可国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1168 1/32开本

9印张 220千字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三中印刷厂印刷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ISBN7—219—02542—4/G·566 定价: 7.40元

目 录

- 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代序） (1)
导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 (9)

上 弘 扬 篇

- 一、中国文化的历程 (25)
 (一) 中国文化的酝酿 (26)
 (二) 中国文化的形成 (30)
 (三) 中国文化的发展 (49)
 (四) 中国文化的衰落与转折 (60)
二、中国精神 (67)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67)
 (二) 自强不息精神 (73)
 (三) 爱国主义精神 (79)
 (四) 宽容和谐精神 (86)
 (五) 崇尚道德精神 (90)

中 吸 取 篇

- 一、西方文化概观 (99)
 (一) 西方文化的历程 (99)
 (二) 西方文化的总体特点 (137)
二、西方文化的精华 (144)
 (一) 西方文化剖析 (144)
 (二) 个性精神 (147)
 (三) 科学精神 (151)

(四) 民主精神	(159)
(五) 法制精神	(165)
(六) 功利精神	(168)

下 建 构 篇

一、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方向	(175)
(一) 以社会主义为基调	(175)
(二) 走向现代化	(177)
(三) 在个性充分发展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导向	(183)
(四) 功利道义并重	(194)
(五) 两大文明同步	(198)
(六) 民主与自由	(201)
(七) 市场化	(206)
二、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内容	(210)
(一) 文化建构：以现代化为主体	(210)
(二)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221)
(三) 民魂再造：高尚文明的价值观	(227)
(四) 丰富发达的艺术文化	(233)
(五) 造就文明新人	(238)
三、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法	(24^)
(一) 继承与借鉴	(2)
(二) 综合与创造	(25)
附录 中国古代文化大事记	(263)

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

(代序)

刘蔚华

我这里谈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也就是关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自此，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便提上了议程。实行改革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两个方面的问题，焦点都集中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以十五年来围绕文化问题展开的讨论，变换着角度与方式，一再提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或者说怎样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选择，以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这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必须解决的一个复杂问题。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自有它的神韵在；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念之所以能够常系人心，自有它的情愫在。这种神韵和情愫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与风俗习惯融为一体，

成为“化民成俗”、不言而喻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只靠过去常用的对古人语录加以筛选并给出新解的办法，是远远不能适应批判继承的需要了。如果只在理论领域进行批判地继承，而不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进行迁神移情的转化工作，是不可能完成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管对它持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的人，大体都能承认儒家的主流派地位。近百年来，儒家思想屡遭沉重打击，总是倒而复振，衰而复昌。究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的深根是植于社会生活土壤之中的，是把雅文化的东西和俗文化的东西融为一体。因此，在今天我们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接受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必须在理论上对儒家文化正确地进行价值选择，同时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做好观念与情感的转化工作。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

理论观念是先导，现实生活是基础。文化形态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都是这两方面双向互动、相互契合的过程。观念形态的现代文明，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作为先进的新文化形态，非但不排斥对它有积极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存在，反而要将其中有价值的成果保留下来，继续作为新文化的构成部分，并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历史的胚基。因此，完全抛弃文化传统，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或者相反，不分良莠，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全面弘扬传统文化，搞文化国粹主义，不仅都是对新文化建设的一种损害，而且根本就无法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在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上，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给以妥善解决。

其一，判明社会历史前提。传统文化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竭力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为阶级已经

不复存在，因而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所特有的社会性冲突也已基本结束，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处理好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前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的黑暗统治，使中国断无自强的可能；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入侵，使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的危险。因此，“振兴中华”就成了近现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救亡图存”与“强国富民”就成为突现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主题。谁将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进步的中国人，纷纷出来，轮番登台，施展抱负；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派、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或早期资产阶级立宪变法的改良派，都没有成功。在文化问题上，当时的反动阶级利用传统文化反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几乎所有腐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都以维护传统文化为旗号，反对民主与科学、反对中国的近代化、反对人民群众的解放。这样就必然要爆发“五四”运动，必然要出现“三纲革命”、“打倒孔家店”一类口号。中国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把这种腐朽的社会基础扫除，传统文化不再是反动阶级手中的一个武器，解放了的人民已经担负起维护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这是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社会前提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所以，过去曾经参加过“打倒孔家店”的战士，今天又成为维护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卫士。这并不奇怪，也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倒退，正是由于历史前提不同所使然。

其二，区分精华与糟粕。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含有精华与糟粕。文明则不同，文化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才属于文明范畴，腐朽的、落后的東西不属于文明之列。例如，酗酒、嫖娼、随地吐痰、抽鸦片烟等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却不能算作文明现象。因此，谈到文化的继承问题，不能不是一种批判地继承，即通过批判分清

精华与糟粕，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毛泽东同志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肠胃的消化运动，食物要经过分解与鉴别、吸收与排泄、合成与转化等一系列复杂的有机过程，才会补充到身体中去，这是很形象而贴切的。实际上，意识形态中的批判继承过程，远比生理过程复杂得多，所谓价值选择、创造性转化，实质上都是一种特定含义的批判继承。数十年来，学术界着力最多的就是分辨精华与糟粕，作为基本的价值选择，多数人是有共识的；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会有分歧，但只要经过认真而充分的讨论，在许多问题上不难取得共识。这主要是在认识、思想、理论的领域进行的。当然，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不可否认，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本身就有种对传统加以选择、提升与进化的功能，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客观地发生着批判继承的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这种客观的进化作用是需要以科学理论作指导的，使它成为一种社会的自觉。近几年来，在文化生活领域中，缺乏理论指导的现象比比皆是，相当突出。

例如有史以来的各种禁书，通过各种渠道几乎大都出版了，作为畅销书，充斥文化市场，而又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指导。我们不否认，历史上的禁书，有些禁得不对。有些腐化之作，则是禁得对的。什么开禁，什么不开，需要郑重鉴别和选择。这就是一种批判地继承。当前，黄色的东西、巫术的东西甚嚣尘上。前者一面扫除，一面泛滥，后者基本上还没有过问。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极为不利的。

其三，顾及全面，抓住主流。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总汇，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有个点和面的关系问题，但是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在其生存发展中，都要迎受来自外部自然界的的压力和内部社会阻抗的压力，文化就是在这两种压力下萌芽发展的。面对这两种压力，中华民族更重视社会整合的作用，

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象》）。所以，重德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儒家文化集中代表了这一传统，是一种以伦理精神为主要特点的文化。它的思想核心，不是一种旨在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知性哲学，而是把人作为主要对象、以整合社会为目的、阐明人生精义为要旨的德性哲学。形成这种特色是和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相联系的。在中国，源于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牢固地保存下来，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大力量。儒家的德性哲学既不仰仗于狂热宗教的感召力，也不求助于抽象思辨的说服力，而以一种纯朴的世俗性的、将血缘宗法关系社会化的伦理精神，为评价一切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建构了一套价值体系，以伦理为本位整合社会；并将这种价值观渗透到政治、经济、教育、艺术、法律等各个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起着调节统整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价值体系，包含了理论观念、道德规范、思想情操、思维模式、行为标准、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等各个层次，形成了立体性结构，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是其他道德学说无与伦比的。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精神乃是一种将宗法关系民族化、社会化的道德文明、秩序文明与聚合文明，三者兼备于一身。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不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聚合作用，只能以血缘的天然联系与秩序为基础，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借以维护社会的有序性，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那时，社会、国家、民族成了家族的放大。这种深入人心的泛家族主义伦理精神，能够使群体要求比较顺利地转化为个体自觉，家庭式亲情推动着人们将外在的道德义务自愿地转化为内在的责任感，进而升华为一种近乎忘我的奉献精神。以亲情待天下人，正是仁爱精神的真谛！儒家伦理精神就是以家族道德为基石，构筑起庞大的道德大厦的。

时代不同了，宗法关系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它所特有的等级

性、压迫性和人身依附性所造成的人与人不平等关系，都应当彻底摒弃。但家庭这种社会细胞将会长期存在，并在东方社会生活中长期发生重要作用。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仍可把家庭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一个生长点，用以培植现代文明。孔子倡导的道德修养三段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把人与人的道德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要求达到三种境界，即严格地修养自己——使自己周围的人得到安乐——扩大到使天下百姓得到安乐。它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内圣而外王”，即内修圣德而外兴王业，修、齐、治、平，以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可以说是儒家的道德逻辑和道德理想。但是要看到，儒学独尊以后，儒家伦理精神便沿着民本主义和专制主义两种价值取向向前发展了。前者重民，切于安民，向往大同；后者尊君，务在治民，严于名份。儒家内部两派之间往往展开激烈的斗争，对他们的评价应当有所区别。

对于儒家伦理精神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选择，概言之，我认为需要注意这样几个要点：

一要准确地把握精华，而不为其局限性所囿；二要给精华的东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而不是煞费苦心地复原历史；三要体现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不停留于历史的社会关系上；四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价值诠释，经过改造超越思想“原本”，而不拘守历史赋予它的表征意义；五要有利于现实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单纯为了缅怀古代；六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不能助长民族离异。如能满足这几点要求，就可以作好价值选择。

其四，关键在于认清现实和未来。21世纪即将来临，可以预计，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一是本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日趋深化，突飞猛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由多极化逐步走向一体化。二是全

球性的社会改革与调整的浪潮，正在曲折中艰难行进，社会的进步不会舒舒服服地取得，要付出并将继续付出巨大的代价。三是在上述两项变革的推动下，各个民族与国家都面临着文化上的优选与更新。既有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人类优秀文化的相互吸收，又有推动文化民族化的强劲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加剧。这都要求妥善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适应于上述经济、社会、文化变动的三大趋势，经济热点、社会热点与文化热点将交替出现，而最终会把矛盾集结在民族文化热点上来。前途将属于那些善于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世界先进文化结合起来的伟大民族。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关注中国传统与未来前途关系的一个出发点。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所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亿万人民“振兴中华”的百年宏愿，就要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半叶实现。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只有在社会不断进步中，才能保存、发展和丰富传统；国家与民族只有立足于先进的行列，才能真正光复旧物。只要我们还处于分散、落后状态，我们就没有力量、也没有条件和资格去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奋发图强与光复旧物是辩证统一的。

其五，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在现实而不是在历史。文化总是在现时代的“挑战一一应战”中发展的。任何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具有永恒的活力，它总是仰仗于现实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才能反过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例如，玛雅文化和人类同期任何文化相比，都毫不逊色，但是玛雅人在西班牙人入侵后，因失败而遁入林莽，这种文化也就随之灭绝了，而不在于这种文化究竟有没有保存价值。生活在高度现代化美国的印地安人长期封闭在“保护地”，照样只能过着原始社会般的生活。因此，正确对待传统

的立足点是迎接时代的挑战，坚持在改革与创新中，形成更强的应战能力和取得更好的应战效果。人类总是在卓有成效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推动整体文化向前发展的。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种一味不加选择地尊崇和颂扬，或一味不加分析地排拒和否定，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它必然会窒息文化发展的生机。只要我们把握住改革创新和迎接挑战这个立足点，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青春！

导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已经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正在进行着更深入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经起步，正在向实质性变革迈进。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文化领域也吹来了改革的春风，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的历史使命，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中国文化新体系的必然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的形成，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是人们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归根到底，取决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新体制的建立。

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与自然相对而言，它包括了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各种事物。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对而言，包括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科学技术，艺术等等。文化与经济、政治制度相比较，具有较突出的意识性，并对经济、政治制度具有较突出的依赖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体系。从我国新文化体系的形成看，经济、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五年，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实证明，没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振兴。

当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和理论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上，经历了复杂的转变。以往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则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将把我国社会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将出现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效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决不仅仅是资源配置领域的变革，它将使所有制领域、分配领域等带根本性的领域出现一系列新事物。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契机，社会改革将向纵深发展，其影响远远超越于经济领域之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改革，我国政治体制也进入了变革的时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必要，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必须随之调整其结构形式和组织方式，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步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受战时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的影响很深，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所以，相应地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实践提出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三大就已经明确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彼此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人民民主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这标志着民主在新质基础上的开端，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后完成。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要实现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任务特别繁重，工作尤为艰巨。

长期以来，我们满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的建立，却忽略了在具体制度和程序方面的建设。因此，尽管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却存在一些重大缺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应该同时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进一步具体化、可操作化，这必将使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实质性的新阶段。

十五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我国目前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巨大社会工程的诸方面是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决不可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的改革。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明显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所以，我国的社会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也是文化领域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要求，归结起来讲，就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或者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

有人可能会说，提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可以了，何必要提什么“文化新体系”呢？实际上，要害正在于这个“新体系”上。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而首先也是一个改革的问题。文化领域的改革